

司法獨立與國家安全的權衡： 再檢視明治時期的大津案

蘇俊斌*

摘要

大津案是一件發生於明治時期之行刺失敗事件。就在日俄戰爭前的十三年，當時還是俄國皇太子的尼古拉二世在訪問日本之際，居然遇到一位名為津田三藏的日本巡警意圖在鄰近琵琶湖的大津市對其行刺。面對著俄羅斯帝國，日本政府與人民都非常恐懼會因此遭受報復。當時明治政府中的許多有力政治人士，甚至向法院施壓要讓該刺客以侵犯皇室的大逆罪接受審判並處以死刑。可是由於缺乏相關的法律根據，大審院的兒島惟謙院長拒絕了來自政府的壓力，並堅持該罪犯因襲擊尼古拉皇太子只能被控以謀殺的罪名，他還企圖說服承辦法官要保障司法切勿受到政治的影響。此案因而成為明治憲法下一項有關司法獨立與國家安全的爭論議題。本文正是試著以法律與歷史的觀點來探討此一大津事件以及其審判。

關鍵詞：明治、大津、大逆罪、大審院、日俄關係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

Weighing up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Reviewing the Otsu Incident in the Meiji Period

Su, Jun-bin*

Abstract

The Otsu case was a failed assassination in the Meiji period. Thirteen years before the Russo-Japanese War, when the Crown Prince of Russia, Nikolai II Aleksandrovich Romanov, visited Japan, a Japanese police officer, Tsuda Sanzo, attempted to kill him in Otsu city near Lake Biwa. Facing the Russian Empire, bo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d a great fear of reprisals. Many powerful politicians in the Meiji government even pressed the court to have the assassin with high treason and punish by death. However, because there was no legal basis,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Judicature (Dai-shin Ing), Kojima Korekata, denied the government's pressure and insisted that the criminal should be charged with attempted murder for attacking Prince Nikolai. He also tried to persuade the handling justices to protect the judiciary from political influence. This case became an arguable issue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Meiji Constitution.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Otsu incident and the trial from the legal and historical views.

Keywords: Meiji, Otsu, High Treason, the Supreme Court, the Japan-Russia Relation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壹、前言

發生於明治二十四年（1891）的大津事件，可說是日本司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而且影響所及也包含政治、外交、社會面。再加上後來一些資料的陸續公開，所以對此案件的探討，從戰前到戰後，甚至在今日，可說是源源不斷。¹ 而且由於涉及面甚廣，除了因為探討角度不同，更因時代背景不同，而有相異的見解，因此顯示出該事件的複雜性。

論及此一事件，身為當事人的大審院院長兒島惟謙（1837—1908）的手記當屬第一手資料，不過該手記是直到當事人都過世後的昭和時期才公開，可見事件之敏感。在法律面的檢討上，除了身處該時代的穗積陳重（1855—1926）教授所提出之意見，宮澤俊義教授於戰敗前發表的〈大津事件之法哲學的意味〉，可說是最先也較完整的論述。² 由於此事件如此戲劇性的發展，更是許多小說戲劇的題材，如吉村昭的《尼古拉遭難》便是描述此事件相關人物的故事；³ 戰後電影「鐵砲安の生涯」（1962）就是以此案的救駕車伕為主角，衍生出來的故事。⁴

對於此事件的看法，一般多是稱許兒島院長挺身抵抗來自政治對司法的干涉，文學家沼波瓊音（1877—1927）因此以「護法之神」的美譽來記述兒島在該案件上的角色。⁵ 而法制史學者瀧川政次郎（1897—1992）更將此案直比王朝時代極少敢與權臣對抗的司法事件：惟宗公方（生卒年不詳）的違式違勅事件（958）與善愷

¹ 此事件的中文介紹在網路上隨處可見，只是這些論述還是集中於兒島院長於司法獨立維持的努力，因而簡化了該案所牽扯到的複雜法律、政治因素，仍有一些在細節上存在未盡之處。而在臺灣，章瑞卿多年前的〈日本大津事件對司法獨立思想之影響〉可說是臺灣相關研究之先驅，該文章收錄於《刑事法雜誌》，34卷5期（1990），頁1-35。

² 原收錄於《法學協會雜誌》，62卷11号（1944），參閱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學的意味吉村〉，《憲法と裁判》（東京：有斐閣，1967），頁193-240。

³ 吉村昭，《ニコライ遭難》（東京：新潮社，1996）。

⁴ 參閱角川映畫，〈鉄砲安の生涯〉（<https://www.kadokawa-pictures.jp/official/42093/>），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⁵ 沼波瓊音，《兒島惟謙：護法の神》（東京：修文館，1926）。

（生卒年不詳）訴訟事件（846）。⁶ 只是另一方面，除了兒島非為審判法官卻也試圖影響判決而存有爭議外，一般常忽略掉最後引用法條與管轄權也有疑問，而且也輕忽當時日本政府與俄國方面簽訂的協定。尤其身處帝國主義橫行而弱肉強食的十九世紀末之國際局勢，俄羅斯帝國對遠東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當時日本的當權者，甚至民間的過度擔心並非杞人憂天，都是為了避免俄國藉機挑事，所以才有當國家安全與司法獨立或法律價值間衝突時，何者為先的爭議。

本文之所以再檢討此事件，主要從兩個方面著眼。一是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也就是從戰前的法律規範角度，但文中也會以戰後的案例作對照；二是對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之探討，如此才能更完整地探究在此一事件中所碰觸到的國家安全與司法獨立衝突時之權衡，而且也綜合戰前與戰後之不同觀點的研究。

貳、邁入立憲國家的日本

就在推翻德川幕府後，新政府決定以明治為年號並定都東京，推動一連串的改革，也就是「明治維新」。「明治維新」雖是以「王政復古」的形態進行，但實際上卻是提倡「百事一新」、「舊弊打破」的近代化政策，並積極於吸收歐美的新制度、知識、文明，且掀起了所謂「文明開化」的風潮。⁷ 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富國強兵」，讓日本能夠與歐美列強並列。既然要躋身於近代化國家的行列，很重要的就是要廢除過去的封建制度，並成為立憲國家。於是在伊藤博文（1841－1909）的歐洲考察後，仿效以德國為主的近代憲政制度。經過了多番討論，終於在明治二十二年（1889），正式對外發佈了這部憲法，大日本帝國憲法，也稱為明治憲法。

若從現代的法治角度來看，這部明治憲法還是存在著許多的缺陷。首先是憲法就

⁶ 違式違勅事件指的是惟宗公方因為在違式違勅罪責上堅持法律見解而遭貶事情。（平安）大江匡房、藤原實兼，《江談抄》，收入於黑川真道編，《國史叢書》（東京：友文社，1914），頁331。善愷訴訟事件指的是法隆寺僧侶善愷控告少納言登美直名（792-853）事情。（平安）藤原良房，《續日本後紀》，《國史大系》，第3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卷16，頁365-379。滝川政次郎，《日本法制史研究》（東京：有斐閣，1941），頁734-744。

⁷ 五味文彦、高埜利彦、島海靖編修，《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頁328。

明白規定整個帝國是基於「萬世一系」(第1條)的天皇總攬統治權(第4條),⁸這也是源於「記紀」神話以來的天皇,就算大權旁落,其身為統治權的最高泉源仍毫無動搖,⁹因而日本古來都以神國自稱。¹⁰也就是明治憲法與其說是如近代以來的歐美憲法是為制約國家權力以保障國民權利,更是為了保障主權者之神聖天皇而存在,因此成為正當化天皇維持秩序的基本,¹¹如法學家渡邊洋三就將之稱為「天皇法治主義」。¹²

就在這天皇主權的不徹底民主制度下,雖然賦予人民有選舉眾議院議員的權利(第35條),¹³但它並非全民的普選,在剛開始只限於納稅一定額度以上的男性,而後經歷了「大正民主」才讓所有成年男子可以行使選舉權,但女性擁有選舉權是直到二戰敗後的事。貴族院雖然也擁有實權,卻與民主選舉無關。而且在規定上,議會的立法權也是以「協贊」天皇的名義行使之(第5條)。¹⁴

至於人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如信教、言論、遷移等各項自由則明確地規定在明治憲法第二章中。只是這些自由,並非基於天賦人權的概念,而是來自於天皇恩賜給臣民的權利罷了,也可說是基於一種「國賦人權」的思想。¹⁵再加上戰前並不存在著違憲審查制,所以人民的自由,不只常面臨於來自行政權的壓迫,也常受到立法權的侵犯。

不過當時的天皇是傾向「御而不治」,國家的政務則由政務與軍務系統分別負

⁸ 第一章第1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第4條「天皇,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本憲法條規行之」。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gallery/0000000001>),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WIKI SOURCE(<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日本帝國憲法>),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⁹ 美濃部達吉,《日本國憲法原論》(東京:有斐閣,1948),頁77。

¹⁰ 見(南北朝)北畠親房撰,宮地直一校注,《神皇正統記》(東京:改造社,1929),卷1,頁11; (室町)瑞溪周鳳,《善鄰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21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1),卷上,頁3。

¹¹ 山中永之佑編,《新・日本近代法論》(東京:法律文化社,2002),頁29。

¹² 渡邊洋三,《法と社会の昭和史》(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33。

¹³ 第三章第35條「眾議院,以選舉法所定,以公選之議員,組織之」。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¹⁴ 第一章第5條「天皇以帝國議會之協贊,行使立法權」。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¹⁵ 佐藤幸治,《新版憲法》(東京:青林書院,1990新版),頁68。

責處理；而且內閣未必是基於議會多數同意而成立的議會內閣制，尤其是黑田清隆（1840—1900）首相還標榜著「超然主義」，主張政府不受政黨所左右。¹⁶ 而在實際上，立憲之初的政局是為薩摩、長州為主的藩閥所掌控，元老們更是擁有極大的權力；軍國主義盛行的昭和時代，內閣往往受著軍方所左右，史上第一個政黨內閣雖是大隈重信（1838—1922）首相和板垣退助（1837—1919）內務大臣於明治三十一年（1898）組成的所謂「隈板內閣」，但這並非意味著從此日本就完全步入政黨政治的議會內閣制。¹⁷

司法權的行使，法院則需基於天皇之名（憲法第 57 條）。¹⁸ 並且依照戰前的裁判所（法院）組織法（第 135 條）規定，在司法行政上，法官是要接受行政機關的司法省之監督。¹⁹ 而最高法院前身的大審院，並非是如同戰後的三權分立體系，大審院院長雖為親任官，但是地位卻低於國務大臣。就在如此的司法制度下，司法權的獨立受到了諸多條件的限制。甚至在當時一些法官的意識上，對於人權的意識並非十分強烈，因而少能善用司法權抑制軍國主義的發展與侵犯人權的事情。例如在戰時（1940）的司法官會同中，大審院的泉二新熊（1876—1947）院長便直接明言：

皇道精神的真髓，是以宇內無比的皇國國體為軸心之君民一體億兆一心，並以和為本，遵守仁義，期待共存共榮。而皇國的立法及司法就需以此為重點而展開，所以若有背逆國體之思想犯，或是破壞當下的統制經濟且危害聖戰的進行及後方的共存等行為，除了有被特別寬容的情況下，應該貫徹法律的精神並處以嚴重的制裁。²⁰

只是憲法雖然規定司法權是以天皇之名行使其，但這並不意味著天皇可指導裁判。就連戰前擁護天皇主權說的法學者上杉慎吉（1878—1929）也否定司法權可受

¹⁶ 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修，《詳說日本史研究》，頁 351。

¹⁷ 小宮一夫，〈日本最初の政党内閣—隈板内閣の明暗〉，收入鳥海靖編，《近代日本の転機—明治・大正編》（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頁 120。

¹⁸ 第五章第 57 條「司法權，由法院以天皇之名，依法律行之」。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¹⁹ 第四編第 135 條第 1 項「司法大臣ハ各裁判所及各檢事局ヲ監督ス（筆者譯：司法大臣監督著各裁判所及各檢事局）」。參閱《裁判所構成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https://ja.wikisource.org/wiki/裁判所構成法>），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²⁰ 小林直樹，《新版憲法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 新版），頁 298。

天皇的指揮命令；佐藤丑次郎（1877－1940）則明言裁判並非受天皇或內閣的命令行使之；市村光惠（1875－1928）也表示司法權是以天皇之名義行使之，指的是法院代替天皇而為，因而須以自己的意思判案，並非受天皇的意思支配。²¹ 而且在實際上，天皇一般也不會直接干涉個案。

雖然明治憲法還是充滿著不少缺陷，但它畢竟讓日本成為君主立憲國家，並具有形式上的法治主義，更因此開始邁入近代文明國家。後來戊戌變法（1898）的領導人康有為（1858－1927）在《日本變政考》中就提到要採行日本的變法，²²而且光緒末年為了立憲運動而出洋考察的王公大臣也認為應效法日本的立憲之舉。²³

另一方面，明治維新既然以歐美列強為仿效目標，所以開放了西方近代思想進入日本，不只伊藤博文等當權派官員吸收德國等的西方憲政制度，一些民間的知識份子或士族，甚至官員也醉心於西方的民主、法治與人權思想，並進而形成民眾運動。這些運動的主要目標包含：

（一）制憲、責任內閣、地方自治，與特別是成立國會之近代政治的確立。（二）包含兵制、學制與司法、警察、官僚制等國家制度之改革。（三）修改不平等條約以確立國權。（四）所有權、營業自由與土地問題改革之經濟活動的保障。（五）自由權、平等權、參政權、生存權等諸多社會政治權利的獲得。²⁴

當時甚至還有抵抗權、革命權與更廣泛的議會權力等比明治憲法更開明、先進的思想出現在一些民間私擬憲法的草案中。²⁵ 正因為西方思想的在日本盛行，當本案發生時，一些日本法學者則紛紛舉西方諸國的例子。只是這些先進的民權活動，居然刺激了政府的敏感神經，所以被伊藤博文稱之為：「利用演講會的暴論以煽動人心，並將毒素蔓延於四方。」²⁶ 為了防止這些民權派的活動持續擴大，於是政府以太政官布告公佈了集合條例（1880），而此一條例其實就是無視人權的來壓抑政

²¹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東京：有斐閣，2001），頁172。

²² 朱憶天，《康有為的改革思想與明治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68。

²³ 柴松霞，《出洋考察與清末立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頁161。

²⁴ 佐佐木克，《日本の歴史17：日本近代の出發》（東京：集成社，1992），頁99。

²⁵ 佐佐木克，《日本の歴史17：日本近代の出發》，頁119-120。

²⁶ 佐佐木克，《日本の歴史17：日本近代の出發》，頁115。

治活動。²⁷ 這也顯示明治維新的主要目的是讓國富兵強，民主的推動並非其首要考量。

參、大津事件的發生與日本政府的反應

在憲法頒佈兩年後的明治二十四年（1891）5月6日，松方正義（1835—1924）接替了山縣有朋（1838—1922）成為新的首相。可是就在松方內閣成立不到一個禮拜時間，日本居然發生了撼動國家社會的大事件，就是所謂的「大津事件」。此一事件不只牽扯到日俄關係而危及國家安全，更衝擊政府與司法機關的互動，也就是對司法獨立與罪刑法定原則等法律價值的影響。

就在還是俄羅斯帝國皇太子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kolai II Alexandrovich Romanov, 1868—1918）以外交親善的目的訪日時，對此貴賓，當然有著盛大歡迎。根據記載：

露（俄）國皇太子尼古拉斯抵達鹿兒島港，威仁親王以下接待諸員乘八重山艦為之響導，午前九時十五分皇太子一行上陸，公爵島津忠義及鹿兒島在職各高官、市民總代表等集合以迎之，先赴縣廳，再到士場授產廠，並巡視煙草製造等，於名山學校接受知事的午餐招待後，觀賞擊劍、棒踊，參觀古器物及名產陶瓷後，在午後零時四十分赴公爵島津忠義邸，受其歡迎……。²⁸

在如此盛大歡迎與招待活動的同時，當然有著層層的戒備，只是尼古拉皇子在遊歷琵琶湖後的歸途中，暗殺事件還是發生。根據記載，事發經過如下：

露國皇太子遊滋賀縣大津，觀賞湖山之勝，午前與希臘國皇子喬治俱出京都旅館，由威仁親王導引……午後一時三十分回歸京都旅館，途中警衛前並無異狀……經過京町筋下小唐崎，時任警衛的滋賀縣巡查津田三藏突然走出，拔出

²⁷ 佐佐木克，《日本の歴史 17：日本近代の出發》，頁 115。

²⁸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 年 5 月 6 日（東京：吉川弘文館，1972），頁 806。

帶刀向太子兩次揮斬，割開帽子，傷及頭部，太子匆匆下車而跑，三藏揮劍追之。希臘國皇子喬治斥喝下車，以竹杖揮打三藏背部，太子車伕向畑治三郎拉倒三藏雙腳，三藏劍落，希臘皇子車伕北賀市市太郎執其劍斬三藏頸、背，警官集結綁縛三藏。事出瞬間，在後方之隨從、接待不知其變，只聞前路喧囂，忽傳狂漢斬殺太子，眾人疾馳現場圍集，混雜騷亂湧現。太子由威仁親王攙扶，倚靠於吳服商永井長助店頭床几，流血淋漓而沾衣袂，並染紅座布團，借親王手巾擦拭血跡，隨從醫師做應急措施，太子神色自若，從容抽菸……。²⁹

此一暗殺事件的確震驚日本，尤其是兇手居然是時任警察的津田三藏（1855—1891）。隨行的威仁親王（1862—1913）即刻上報明治天皇（1852—1912），在當天下午三點半電報就發到宮中，並由宮內大臣土方久元（1833—1918）通報明治天皇，天皇聞後大驚，而受天皇信任的伊藤博文也立刻從箱根趕回東京，雖然伊藤趕到皇宮時已是隔日凌晨一點多，但天皇仍然在寢宮召見。隨後伊藤又與大臣開會到三點，並在早上六點多於新橋停車場送別天皇，天皇隨即前往京都探望受傷的尼古拉，並向其表達歉意。³⁰ 如此緊急地召集重臣開會，也是宮中所未曾有的情況。³¹ 而後又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司法大臣山田顯義（1844—1892）便提出要以普通謀殺未遂與對皇室的罪兩方案檢討，前者的話最多只是無期徒刑，後者才有可能判處死刑。但伊藤博文卻直言此事件非同一般犯罪，為救國家於緊急狀況中，非以非常手段難止。諸大臣也贊同此一見解，並決定為政府方針。³²

另一方面，當天皇風塵僕僕地抵達尼古拉住宿旅館欲行探望時，卻被以天色已晚不適合養病為由而遭婉拒，只能隔日再來。³³ 神聖的天皇在日本國內被拒之事，在日本帝國時期可說是非常罕見，但迫於現實也不得不忍受。而且在尼古拉歸國前，天皇被尼古拉拒絕原本的宴請後，還親上俄艦送行；儘管許多大臣擔心天皇會面臨如朝鮮大院君（1820—1898）於壬午事件後遭到清軍強扣的風險，畢竟當時停靠在

²⁹ 宮內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1日，頁810-811。

³⁰ 礪川全次，《大津事件—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東京：批評社，1998），頁221、240。

³¹ 參閱《時事新報》，1891年5月12日報導，收錄於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と明治天皇：新聞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啓松堂，1933），頁222-223。

³² 馬場恒吾，《伊藤博文》（東京：潮文社，1942），頁181。

³³ 宮內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2日，頁817。

神戶的俄國軍艦之威勢，遠非當地日艦所能及。³⁴

明治天皇與昭憲皇后（1849－1914）也致電給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 1845－1894）與瑪麗亞·費奧多蘿芙娜皇后（Maria Feodorovna, 1847－1928），深表痛惜之意。³⁵ 明治天皇更以勅語發佈：

此次朕所敬愛之露國皇太子來遊，朕及朕之政府與臣民以國賓大禮歡迎，不料於途中在大津遭難，接此警報，令朕不勝痛惜，對暴行者應儘速懲罰，勿損毀善鄰之友誼，以體朕意。³⁶

然而在此事件上，明治天皇的立場就非常重要。身為國家元首的天皇從政治的立場積極介入處理讓事件平息，並無任何問題。就在事發後，天皇除了親下勅令表示痛惜與召開御前會議外，更在審判期間下達勅令：「今般露國皇太子相關事件是國家大事，須注意而迅速處分。」³⁷ 然而天皇是否對法條的引用問題提出意見，就存在些許爭議。雖然不少論者認為天皇在此案件上只是消極的角色，但是也有論者認為天皇支持適用對皇室的罪，³⁸甚至要求檢事總長三好退藏（1845－1908）對犯人以侵犯皇室罪而處死刑。³⁹ 在天皇不介入個案下，明治天皇雖不可能直接下令給法官，但是在憲法剛發布且憲政慣例也未確定之際，天皇以間接的方式影響判案，或是政府官員擴大解釋天皇意見，似乎也是難以避免，例如內務大臣西鄉從道（1843－1902）便曾明白表示沒判處犯人死刑的話，將會違背聖旨。⁴⁰ 尤其當時日本國內還存有排外主義，為了消除俄國對此行的安全疑慮，明治天皇曾經承諾：「俄羅斯皇太子來遊由我自身負責，其身體就如同我的身體神聖不可侵犯，我以名譽保證其安全。」⁴¹ 因此當暗殺事件還是發生，對明治天皇的衝擊可想而知。只是在當時天皇神聖不可侵的原則下，法律見解不同的雙方，都盡量避免批判天皇的立場。甚至在事後，也有如笹川臨風（1870－1949）認為日本能脫離此一危機而讓國家穩如泰山，全是天皇一己之

³⁴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9日，頁829。

³⁵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1日，頁813-814。

³⁶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1日，頁814-815。

³⁷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20日，頁843。

³⁸ 礪川全次，《大津事件と明治天皇—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頁221、240。

³⁹ 新井勉、燕山巖、小柳春一郎，《ブリッジブック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東京：新山社，2011），頁170。

⁴⁰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25日，頁848。

⁴¹ 新井勉，《大津事件～司法権独立の虚象》（東京：批評社，2014），頁51。

力；⁴² 另外也有將此功歸於天皇之「聖德」與皇后之「坤德」者。⁴³

在民間，上萬封慰問信紛紛湧入，不少政界、商界、教育界的人物則公開表示關懷的意思。⁴⁴ 而東京的證卷交易所也因此暫停歇業，各地的神社、寺廟紛紛地為尼古拉祈禱，首都吉原等處的娛樂場所也停止音樂取樂。⁴⁵ 當時的新聞曾描述因為此一事件的影響：

都內光景何其寂寥，新柳狹斜之街道不聞弦聲，料理屋、酒店客人足跡大減，近來大量魚獲持續，卻是充斥日本橋，平口魚、鮪魚乃罕見的廉價，成為貧民之膳食。⁴⁶

更誇張的是山形縣最上郡金山村，居然通過村的地方條例不許村內居民使用津田的姓與三藏的名字。⁴⁷ 另外也有被稱為「房州烈女」的畠山勇子（1865—1891）到京都府廳前自殺以為日本謝罪，只不過這種忠義的行為，也只是人們稱道的題材而已。⁴⁸

而政府方面，則立即於該年的 5 月 16 日頒布緊急敕令 46 號，⁴⁹並檢查報章以避免有不利的消息報導。⁵⁰ 不過由此也可看到明治憲法對此「臣民的權利」之言論自由的保障不完全，此一緊急敕令對言論的限制，亦造成許多新聞媒體的停刊，還因此引起了新聞界與反藩閥力量的激烈反彈，後來在議會的事後審議時也引起不少的爭論。⁵¹

⁴² 笹川臨風，《明治還魂紙》（東京：亞細亞社，1946），頁 34。

⁴³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の聖德總論編》（東京：千倉書房，1942），頁 287。

⁴⁴ 內閣官報局，《官報》，1891 年 5 月 18 日，2362 號，頁 200-203。

⁴⁵ 平野晨，《明治大正昭和歷史資料全集暗殺篇》（東京：有恒社，1932），頁 133。日埜博司，〈ポルトガルの文人モラエスの見た大津事件と烈女畠山勇子〉，《流通経済大学論集》，31 卷 4 號（1997），頁 87。

⁴⁶ 參閱《日出新聞》，1891 年 5 月 17 日報導。收錄於日埜博司，〈ポルトガルの文人モラエスの見た大津事件と烈女畠山勇子〉，頁 87。

⁴⁷ 參閱《時事新報》，1891 年 5 月 22 日報導。收錄於平野晨，《明治大正昭和歷史資料全集暗殺篇》，頁 155。

⁴⁸ 參閱《日出新聞》，1891 年 5 月 26、28 日報導。收錄於日埜博司，〈ポルトガルの文人モラエスの見た大津事件と烈女畠山勇子〉，頁 88。

⁴⁹ 內務大臣特頒命令，針對新聞雜誌或文書圖書有記載外交相關事件者，需預先將其草案提出接受檢查，且對違反處以一個月以上兩年以下禁錮刑與二十圓以上三百圓以下罰金。參閱《東京日日新聞》，1891 年 5 月 17 日報導，收錄於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と明治天皇：新聞を中心として》，頁 247。

⁵⁰ 參閱《東京日日新聞》，1891 年 5 月 17 日報導。收錄於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新聞を中心として》，頁 247。

⁵¹ 內川芳美，〈大津事件の報道をめぐる統制と抵抗：明治二十四年勅令第四十六號を中心として〉，《新聞学》，4 卷（1955），頁 55。

但對日本政府而言，最為懼怕的就是俄羅斯藉機向日本提出無理的要求，或是採取出兵等報復手段。雖說近代以來，國際法就是往各個國家的平等獨立地位邁進，但實際上大國對小國的控制至今也未完全消除，更何況是弱肉強食、帝國主義盛行的時代，任何侵犯大國權益的事件，都足以造成兵禍的理由。如第一次大戰的導火線就是非常類似，由於奧匈帝國的皇儲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 1863—1914）在訪問薩拉耶佛時被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分子所刺殺，奧匈帝國於是對塞爾維亞提出嚴苛的要求。而英法聯軍之役（第二次鴉片戰爭）就是導因於清廷在亞羅號事件及西林教案上的誤判；就連「牡丹社事件」（1871）根本是日本藉機發揮，再加上清廷的錯誤對應，最後居然導致琉球亡國。更不要說日本本身只因「朝鮮蔑視皇國，謂文字有不遜」，就主張「不伐之則皇威不立也」，到最後還是強併朝鮮。⁵²

日本雖然在明治維新後積極步向西化，但當時的日本因其不平等條約尚未完全修改，不具完整的關稅自主權，甚至領事裁判權也未廢除，所以在國際法上仍被視為「不完全主權國」；⁵³加上當時日本尚未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就其實力與國際地位而言，僅被視為一介東洋小國，對於這橫跨歐亞大陸的「北門的強敵」之恐懼，絕非杞人憂天。

日本之所以有「恐俄症」，除了地理的鄰近外，對於 1861 年「強佔對馬事件」中俄羅斯展現的優勢武力，應仍記憶猶新，⁵⁴而且英國公使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 1828—1885）也曾經有意地傳播對俄國的警戒觀念。⁵⁵其實俄羅斯對遠東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早在十六世紀末俄人即開始逐漸往西伯利亞移植，並巧取豪奪清帝國東北的土地，尤其不久前俄國才與清廷簽訂「璦琿條約」（1858）與「北京條約」（1860），明治政府要人對此應有一定的警覺。

相對於「恐俄症」這種對外恐懼論，也有一些主張對外強硬論者。例如早在日俄間為了庫頁島的處理爭議上，就有大久保利通（1830—1878）等人是認為不惜動

⁵² 〈佐田白茅外二人歸朝後見込建白（1870 年 2 月 25 日）〉，《公文錄・305 卷・朝鮮講信錄》，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公 01697100。

⁵³ 山本草二，《新版國際法》（東京：有斐閣，1994），頁 24。

⁵⁴ 「強佔對馬事件」所指為俄羅斯曾因對遠東的野心，居然於幕府末年派遣軍艦停泊占領對馬芋崎浦半年餘，後因當地居民的反彈與英國的介入才退去。參閱金澤利明、竹內秀一等編，〈對馬事件〉コトバンク，《旺文社日本史事典三訂版》（<https://reurl.cc/pxYVad>），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⁵⁵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説》（東京：慶応通信株式会社，1994），頁 33。

用武力的強硬派者。⁵⁶ 這些強硬派者更有主張要擊敗清朝與朝鮮而稱霸東洋，尤其是關於「征韓論」的爭議還導致明治六年（1873）的政變，這也顯示日本在明治維新後，便存在著稱霸亞洲的野心。

至於兇手的動機，根據其供詞等的分析，則有以下的幾種說法：一是尼古拉來日本的目的是為了對日本的偵察，而且抱持此一想法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數，如德富蘇峰（1863－1957）創辦的《國民之友》雜誌就直指「俄國皇太子的旅行，果真是單純的參觀旅行，或是兵事上的探討旅行呢？」⁵⁷ 二是令人質疑的是既然來日本訪問，為何沒先去東京面見天皇？三是既然要與俄羅斯締結交換庫頁島的不平等條約，為何又要以國賓歡迎皇儲。四是居然有傳言本來在西南戰爭失敗已死的西鄉隆盛（1828－1877）要在尼古拉訪日時歸國，並且要剝奪在西南戰爭有功者的勳章；而犯人津田三藏正是西南戰爭的受勳者，甚至其於西南戰爭結束後，在 1877 年 9 月 25 日給母親的信中還如此提到：「當月 24 日午前第 4 時之大進擊的勝利，乃擊斃魁首西鄉隆盛、桐野利秋之大愉快戰爭，且斬首殘賊無計」。⁵⁸

在津田回答大津地院檢事種野弘道的問案時，就明指尼古拉的大逆無禮及近江地理的探查，後述的判決則明顯提到兇手的動機根本是源於個人的妄想，其實也難免於當時蔓延於日本的「恐俄症」之影響。⁵⁹ 然而不管兇手動機如何，的確造成日本全國的大騷動，尤其政府當局為了避免事態擴大，盡力安撫俄羅斯方面，並嚴懲兇嫌。其實過去日本也常因懼外心態，在司法上嚴以律己，寬以待外，如發生在日本開國初期的神戶水兵衝突事件與巴夏禮公使暗殺未遂事件（1868），結果以武士瀧善三郎（1837－1868）切腹謝罪以及將犯人三枝蓊（1840－1868）與朱雀操（？－1868）判處斬刑收場。⁶⁰ 另外，在「吹田事件」（1890）上，雖是德國皇室一行

⁵⁶ 池井優，《增補日本外交史概説》，頁 35。

⁵⁷ 參閱《國民之友》，1891 年 4 月 3 日報導，收錄於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1853-1972》（東京：每日新聞社，1974），頁 155。

⁵⁸ 日高恒太郎，〈大津事件〉（收入佐藤實編，《天皇・皇室事件史データファイル》，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2），頁 27。

⁵⁹ 小島德彌，《明治以降大事件の真相と判例》（東京：教文社，1934），頁 363。

⁶⁰ 神戶水兵衝突事件指的是駐紮在神戶港的外國水兵由於穿越備前藩兵隊伍行列，而被砲兵隊長瀧善三郎（1837-1868）認為是失禮的行為而引發出與西方國家的衝突，結果瀧善三郎被判切腹謝罪。參閱フランク・B.ギブニー 編〈神戶事件〉コトバンク《ブリタニカ国際大百科事典》(<https://reurl.cc/RbkENe>)，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巴夏禮公使暗殺未遂事件指的是英國公使巴夏禮一行人進宮途中被暗殺未遂事件，而犯人三枝蓊與朱雀操仍以判死收場。參閱宮武外骨，〈外人傷害の暴徒〉，《文明開化（4）裁判篇》（東京：半狂堂，1926），頁 2。

在禁止狩獵的地區遊獵且與當地警民發生衝突，但還是在外務省的政治交涉下，由日方謝罪來妥協此一刑事案件，因而被認為是宮廷外交優先於法律秩序。⁶¹

由於御前會議及緊急閣議一致認為要將兇手處死，⁶²因此決定引用當時刑法116條的對皇室危害罪，也就是「加害或意圖加害天皇、三后（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及皇太子者處以死刑。」在此所謂的加害包含危害性命及損害身體的所有行為，而且不論既遂或未遂犯，甚至連只是訂定計畫但未實行者皆包含在內，都必須處以死刑。⁶³

的確因為明治政府是建立在天皇主權上，其政權的合法性，與其說是來自法律制度或是被統治者的同意，更重要的是如同韋伯所闡述的，是來自長久相傳的規則與權力的神聖性之所謂傳統型支配，⁶⁴再加上天皇被神格化，所以憲法第3條則直接規定「天皇是神聖不可侵」。⁶⁵而且不只在於對身體的冒犯，連指責、議論也不許可。⁶⁶當初制定的刑法雖然以法國為主的大陸法為範本，卻也是具有讓天皇統治合法化的目的。⁶⁷於是刑法二篇第一章就有對皇室的罪，當中以對皇室毀謗之「不敬罪」及傷害皇室成員的「大逆罪」最為顯著。尤其對於謀反大逆罪，在明治三年（1870）制定新律綱領時，身為參議的副島種臣（1828－1905）卻以日本「國體卓越萬國」與「皇統連綿」而「自古來未嘗有覬覦社稷者」為由，極力反對「賊盜律」中有相關的規定。⁶⁸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的舊刑法中才設有對此罪，而當時正

⁶¹ 吹田事件係指德國皇孫海因里希（Albert Wilhelm Heinrich, 1862－1929）一行在訪問日本時，因為在禁獵的小路村釋迦之池地方狩獵，因而與當地的農民與巡警發生衝突，結果日本政府不只向德國致歉，並還處罰了不少巡警。參閱山中敬一，〈1880年プロイセン皇孫ハインリヒ吹田遊獵事件〉《關西大學法學論集》，67卷1號（2017），頁45-111。新井勉，〈大津事件の再構成〉（東京：お茶の水書房，1994），頁126-127。

⁶²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1）—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經濟論叢》，43卷5號（1970），頁7。

⁶³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144。

⁶⁴ 韋伯著，康樂編譯，〈支配的類型〉（臺北：允晨文化，1985），頁47。

⁶⁵ 第一章第3條「天皇為神聖不可侵犯」。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⁶⁶ 伊藤博文著，日本國學振興會譯註，〈新譯帝國憲法義解〉（東京：日本國學振興會，1938），頁27。

⁶⁷ 大庭祐介，〈明治初期の思想狀況と旧刑法の意義〉，《國史學》，17號（2013），頁82、93。

⁶⁸ 新律綱領為明治初期制定的刑法典，後來又以改定律例補充之，其中的「賊盜律」部分主要規範竊盜強盜、劫囚、詐欺取財等等罪刑。參閱司法省，〈新律綱領・改定律例〉（東京：司法省，1873），頁124-144。

是由伊藤博文任刑法草案審議局的總裁。⁶⁹

順道一提的是，雖然日本皇室常被標榜是「萬世一系」（明治憲法第1條），⁷⁰但若說從無覬覦社稷者，則並非實情。例如古墳時代，就有「欲王日本」的大臣「平群真鳥臣」；⁷¹奈良時代也有「矯八幡神教言，令道鏡即皇位天下太平」之事；⁷²准三后的足利義滿（1358—1408）也被視為具有謀位的野心。副島之言，應是溢美皇室或是反對特設大逆重罪。

在天皇越來越神聖化後，不敬與大逆之罰則還被擴大適用，例如身為第一高中教員的內村鑑三（1861—1930）的「不敬事件」（1891）；幸德秋水（1871—1911）的「大逆事件」（1911），更是造成多人的冤死。⁷³當然若以現代君主立憲的角度來看，這些對皇室的法律的確有爭議的地方，所以在戰後憲法的「天皇象徵制」（第1條）下就不再存在。⁷⁴

不過在明治憲法的天皇主權原則下，當時對因觸犯「不敬」與「大逆」而受到重罰的案例鮮有疑問，但其爭議在於對皇室的罪是否可推用到俄羅斯皇室身上。在封建時代的日本，對於不存在法條的犯行，的確可以推用類似的罪罰而稱之為「斷罪無正條」；或是基於情理而處罰的「不應為條」原則。而且封建時代日本的司法制度與中國王朝時代類似，並非像近代的西方司法制度是基於權力分立的概念。例如在江戶時代負責審判工作的町奉行、評定所，其實是具有行政機關的性質。甚至在明治維新之後所制定的新律綱領，仍未真正確立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允許類推適用以及在判刑上也承認政治、政策考量的必要性處置。⁷⁵

⁶⁹ 穗積陳重，《法窓夜話》（東京：有斐閣，1916），頁26-28。

⁷⁰ 第一章第1條「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⁷¹ （奈良）舍人親王著，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貞、大野晋校注，《日本書記三》（東京：岩波書店，1995），卷16，〈武烈天皇〉，11年8月，頁449。

⁷² （平安）菅野真道，《續日本紀後篇》，（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12卷，東京：吉川弘文社，1984），卷30，〈稱德天皇〉，頁369。

⁷³ 不敬事件指的是一高教師內村鑑三因基督教信仰而不願對天皇署名的教育勅語行最敬禮竟被迫離職事件。大逆事件指的是幸德秋水等人被控謀殺天皇而冤死事件。參閱五味文彦、高埜利彦、島海靖編修，《詳說日本史研究》，頁381、383。

⁷⁴ 第一章第1條「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參閱日本國政府編，日本國駐華大使館譯，《日本國憲法》，維基文庫（<https://reurl.cc/mvzYLj>），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0日。

⁷⁵ 北条浩、宮平真弥，〈日本近代刑法の成立過程〉，《流經法学》，9卷1號（2009），頁35。

然而本案發生時，明治舊刑法已經公布。雖然此舊刑法因學習大革命混亂期的法國刑法而有亂世治重典的意味，卻還是保留罪刑法定的規定。⁷⁶ 在舊刑法第 2 條便是強調「法律正條」來確定此一原則；第 3 條更是規定法律頒布前的犯罪則在新舊法對比下以較輕罪責處罰；而且舊律的不應為條則被廢除，援引比附也不允許。⁷⁷ 也是仿效法國的刑事訴訟法之治罪法則在明治十三年（1880）公布，而後於明治二十三年（1890）隨著裁判所構成法的制定而修正成刑事訴訟法。另外在已頒布的明治憲法第 23 條中，也有著臣民需依法律才能被逮捕、監禁、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⁷⁸ 因此當日本政府要將刑法擴大解釋，引起諸多爭議勢必難免，首先站出來反對的就是大審院的兒島惟謙院長。

肆、兒島院長的主張及爭論

兒島惟謙雖然是貴為大審院長，可是他並未曾接受完整的法學教育，多是靠著後來的學習吸收法律的知識。不過直到明治十三年（1880），日本的司法官都是自由任用，不少法官是來自曾經擔任裁判的官吏等之武士階級出身者，而且也未受過近代的知識、技術教育。⁷⁹ 直到明治四年（1871）才為了培養司法官及擴充司法制度設置「明法寮」，而後又改為司法省法學校，更完整的法律教育則是要等到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的成立，此外又有一些私立法律學校陸續的設立。⁸⁰ 之前幕府在黑船事件後所設置的「洋學所」、「蕃書調所」，只是在廣泛地學習西方各種事情及語文。

兒島之所以步入仕途，是因為參加尊王倒幕運動，並且在明治初期服役於討伐

⁷⁶ 大庭祐介，〈明治初期の思想状況と旧刑法の意義〉，頁 103。

⁷⁷ 高柳真三，〈日本法制史二〉（東京：有斐閣，1965），頁 204。

⁷⁸ 第二章第 23 條「日本臣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⁷⁹ 山中永之佑編，〈新日本近代法〉，頁 187-188。

⁸⁰ 明治時的法學教育，參閱池田眞朗，〈日本法學教育史再考：新世代法學部教育の探求のために〉，《武蔵野法學》，5-6 號（2016），頁 45-82。

東北時的參謀楠田英世（1831—1906）帳下，又歷任了新潟縣及品川縣的地方行政首長。後來才在楠田的推薦下進入新設置的司法省，且在隔年成為法官。而在其法官任內，又作出了許多維護人民權益及堅持法治原則的判決。例如在「大阪府事件」上，兒島就排除了來自政治的壓力，為民眾免除了獻金的重壓。在「鶴岡事件」（1873—1876）上，則在各種壓力下，判定了森藤右衛門（1842—1885）對於鶴岡縣控訴的勝訴。在「三重暴動事件」上，兒島判決因為苦於地租修改而暴動之萬名農民無罪。而在「大阪國事犯案」（1885）上，已身為大阪高院（控訴院）院長的兒島，更是堅持「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避免了伊藤博文內閣意圖以事後法來嚴懲敵對的自由黨大井憲太郎（1843—1922）等人。⁸¹ 因此，當政府意圖在特定案件上干涉法院判決時，就當時已升任為司法最高首長的兒島而言，採取對抗內閣的作法即非意料之外。

就在案發後，松方首相與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1844—1897）便將兒島院長召至官邸曉以大義，勸說要避免損害俄國感情而引發國家大事，對於傷害天皇陛下貴賓的俄國皇太子之犯人，應以刑法 116 條的對皇室危害罪處治。⁸² 起初兒島還建議以發布緊急勅令的方式將外國的皇族也包含在日本皇族內，卻遭到樞密院、法制局的拒絕。⁸³ 之後兒島就反對直接將刑法 116 條延伸解釋，而其理由大概如下：

一是刑法上的天皇沒有冠上「日本」兩字，⁸⁴本來就是指日本的元首。二是對皇室危害罪是置於刑法第二篇的「公益相關罪」中，在此公益指的當然是日本的公益，而危害日本皇室正是犯了危害日本公益的罪行；但是加害俄國皇太子的犯行是危害俄國的公益，與日本的公益無關。三是若將危害日本皇室的刑罰條文適用在危害俄國皇太子上，是喪失國家獨立自主，失去主權的行為。⁸⁵

⁸¹ 大阪府事件指的是知事渡邊昇（1838—1913）以國益之名強收居民獻金所引發的抗爭與訴訟。鶴岡事件是源於鶴岡縣的行政改革所引發的紛爭。三重暴動事件是源於地租修正所引發的農民抗議紛爭。大阪國事犯案指的是由於韓國問題所引發的，伊藤博文政府試圖以事後法來嚴懲敵對的自由黨大井憲太郎（1843—1922）等人爭議。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1）—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 4-5。

⁸² 宮內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 年 5 月 19 日，頁 836。

⁸³ 新井勉、燕山嚴、小柳春一郎，《ブリッジブック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頁 170。

⁸⁴ 明治時期刑法第 2 篇第 1 章是規定「對皇室之罪」，116 條也是規定「對天皇三后皇太子加害者」。參閱《刑法》（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 36 号），WIKISOURCE（[https://ja.wikisource.org/wiki/刑法_\(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36号\)#2-1](https://ja.wikisource.org/wiki/刑法_(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36号)#2-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⁸⁵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 146。

另外，兒島院長在提出給松方首相及山田司法大臣的意見書也提到外國的相關規定做比較：

首先在俄國，依照刑法 260 條，有同等對外國帝權的犯罪規定，但與對自國犯罪者相比，其刑罰甚為輕微，有著死刑與兩年半以下勞役的差別。而且也沒有特別包含對外國太子的規定。在德國，則是依照刑法 302 條處 1 年以上 10 年以下監禁，而義大利則是依刑法 417 條處以 11 年以上 16 年以下徒刑，兩國都是限於君主與總統，外國太子相關者的規定並不存在。⁸⁶

當時的日本法界，多數還是支持兒島院長而批判內閣，反對政治對司法獨立的侵犯。⁸⁷ 身為法界人士，第一考量的就是法治原則，提出與政治人物或外交官不同的看法是理所當然。尤其如兒島院長所反駁，法律是國家的動脈，是否發生戰爭並非法官所關心的；而且無視法律的話，將為俄國及列強所嘲笑，並且產生難以說出的弊害。⁸⁸ 兒島也批判說，這只是政府為了要遮掩失策以及隱藏與俄國的約定，因而意圖加諸司法部門；司法部門若強吞此密約，將難以從國民的印象中洗去政治裁判的不名譽嫌疑。⁸⁹ 而帝國大學的法科教授也多反對引用刑法第 116 條，例如穗積陳重教授後來回憶寫道：

當時，我等法科大學同僚也將意見向上呈報，評論若以對皇室之罪處罰三藏之非。然而當局及元老政治家等意見是若不處死三藏以向俄國謝罪，國難將隨即而來。是先有國家後才有法律，只拘泥於法文之利而忘卻國家之重，不過學究之迂論，因此主張應活用法律以拯救帝國於危難之際。⁹⁰

然而相對於司法人員以法律為第一判斷，政治人物與外交官卻是從國家的安危來考量此一司法案件，因此才會把政治凌駕於法治之上。如松方首相就直指國家生存是比法律條文更為重要，可說是一種國家緊急權的邏輯。⁹¹ 內務大臣西鄉從道更

⁸⁶ 田畑忍，《兒島惟謙》（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頁 181-182。

⁸⁷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權の獨立（3）—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經濟論叢》，51 卷 3-4 號（1978），頁 54。

⁸⁸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權の獨立（3）—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 62。

⁸⁹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權の獨立（2）—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經濟論叢》，51 卷 1-2 號（1978），頁 40。

⁹⁰ 穗積陳重，《法窓夜話》，頁 26-28。

⁹¹ 小林直樹，《新版憲法下》，頁 297。

明言若沒將犯人處決，除了違背聖旨外，「俄羅斯艦隊一旦攻進品川灣，發炮後我帝國就成塵灰。這讓法律不只保不住國家的和平，而且還成為破壞國家的工具。」⁹² 從上述的薩拉耶佛的暗殺等例子，就可知道當時弱肉強食的國際險境，而這些明治政府的掌權者應該也明白當中的利害關係。

其實當時的日本往往因為俄國的強大，高估了其法治文明，就連兒島院長應該也是如此看法。雖然因地緣關係，俄羅斯在十八世紀便受到西洋近代法的影響，而且在十九世紀除了解放農奴，更以法國為本進行司法改革。但是另一方面，除了「法虛無主義」(legal nihilism)的盛行外，為了維護沙皇的專制與身分制度，直到二十世紀初頒布憲法後才有了君主立憲的雛形，而且國會是受到許多限制下才得以設立與運行。⁹³ 而對俄羅斯帝國的人民而言，法不過是國家對民眾的嚴苛管理工具，而且是由專制權力肆意發揮，因此對法的信任度相當的低。⁹⁴ 其實從法治程度來看，俄羅斯還是落後於日本，更難與英美等先進國家能相提並論。面對如此的大國，包含清朝在內的不少周遭國家，確實飽受其侵擾之苦，例如俄羅斯就無視與清廷簽定的「交收東三省條約」(1902)而悍拒撤兵。

對於兒島的阻止，政府也構思許多其他方案要置津田於死：一是發佈戒嚴令且追溯至事件當日，因而可以宣告津田死刑；⁹⁵ 二是發佈緊急勅令，將對皇室的罪罰擴充到外國皇室；三是利用外交手段，由俄國出面要求日本判兇手死刑，只是當時的俄國公使崔維其(Dmitri Schevich, 1839—1906)並沒有如此做，反而在私下警告伊藤博文若不判兇手死刑便無法保證兩國會出什麼事；最後就是派出刺客將津田時殺於獄中，並對外聲稱病死。⁹⁶

這些構想終究沒有實行，於是政府方面方面就試圖跳過兒島院長，直接從大審院的承辦法官著手。根據估算，七位承辦法官，除了安居修藏、井上正一(1850—1936)兩位與內閣官員沒有什麼個人關係外，土師經典因出身鹿耳島，故與西鄉內

⁹² 宮内庁，《明治天皇皇紀第七》，1981年5月25日，頁848。

⁹³ 渋谷謙次郎，《法を通してみたロシア国家》（東京：ヴェッジ，2015），頁11-12、33-35。

⁹⁴ 栖原学，〈ロシアの市場経済と法文化〉，《経済科学研究科紀要》，31號（2001），頁97。

⁹⁵ 有關戒嚴令，參閱新井勉，〈大津事件における立憲制の危機〉，《日本法学》，79卷4號（2014），頁19-23。

⁹⁶ 緒方真澄，〈児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1）—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8-9。

務大臣有良好關係，並被視為與內閣同調。因此司法大臣山田顯義（1844—1892）、農商務大臣陸奧宗光等政府要員便親自赴司法省試圖說服堤正巳（？—1891）、中定勝、高野真遜及木下哲三郎（1853—1907）四位法官。⁹⁷

另一方面，兒島也不是置身事外，除了在與松方首相等會面的隔日，便召集大審院法官進行討論，並進而得出「刑法中指的天皇只是日本天皇」之共同結論外，⁹⁸並試圖說服承辦法官拒絕來自政治的干涉，於是展開了一場「護法」抗爭。

伍、大津案的法律爭議

因為本案是發生於十九世紀末，當時的法律概念與現在雖然有些基本原則仍然相似，但在實質上還是存在不少差異，所以探討該案件，則須以當時的法律見解論述。而對於此一事件的法律問題，根據宮澤俊義教授所言，關係到了法律內在與超越法律的兩項爭議點，⁹⁹不過這也是一般對該案的法律爭議之看法。

在法律內在爭議點，首先就是程序面上，最重要的是維護司法獨立。而當時的裁判法第 143 條便已規定法官在職務上的獨立，¹⁰⁰然而也誠如當時任職於東京高院的法官伊藤悌治（1858—1919）在課堂上所言，法院之所以不被社會信賴，還是因為法官判案時會受到司法大臣與上司所左右。¹⁰¹而政府的要求以刑法對皇室的犯罪來辦此案，當然是赤裸裸的侵犯司法獨立。只是司法獨立並不只是來自外部的干涉，司法內部的干涉也應被排除，例如戰後的「平賀書簡事件」就是著名的例子。¹⁰²當時札幌地方法院正在審理有關航空自衛隊的基地建設糾紛，時任札幌地院長官平賀健太郎居然私信給審判庭長福島重雄勸其駁回停止執行的申請，而福島法官卻

⁹⁷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權の独立（2）—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 41-42。

⁹⁸ ドナルド・キーン，角地幸男譯，《明治天皇下卷》（東京：新潮社，2001），頁 137。

⁹⁹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頁 196。

¹⁰⁰ 第四編第 143 條「此篇所揭示前述各條規程是不許對在裁判上執行職務之判事的裁判權有所影響或限制」。參閱《裁判所構成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

¹⁰¹ 新井勉、燕山巖、小柳春一郎，《ブリッジブック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頁 168-169。

¹⁰² 參閱福島重雄、水島朝穂、大出良知，《長沼事件平賀書簡—35 年目の証言自衛隊違憲判決と司法の危機》（東京：日本評論社，2009）。

認為這是影響到司法獨立而將此信公開，結果引發不少爭議。順帶一提，雖然地院在該長沼案上判決自衛隊違憲，但後來上訴到最高法院卻迴避了違憲判斷。¹⁰³

兒島就算身為大審院長，畢竟不是承辦法官，卻以長官的身分勸說審案法官以一般殺人未遂罪審理此案，也是難免有干預法官獨立判案的爭議，而這也是裁判所構成法 143 條所規定。¹⁰⁴ 例如憲法學者佐藤功便直指兒島的行為，是為排除來自政治壓力而擁護司法權獨立，但卻又侵害了法官的獨立。¹⁰⁵ 但相對地，則有反駁說早在案件移送大津地方法院時，該法院就已自行放棄司法獨立的原則。當時擔任大津地院院長的千葉貞幹（1852－1913）面對牽扯如此多的政治因素案件，居然不是依法讓承辦法官獨立審判，反而向三浦順太郎及土居庸太郎兩位承辦法官明言：「本案的審理在實際上是關係司法權消長的重大問題，並非容易決定，所以要直赴京都與三好檢事總長面會，聽取傳聞的事實，並且準備與司法部的前輩協議。」而三浦等人也回答：「臨機的處置，盡憑院長」。¹⁰⁶ 因而如泉二新熊就為兒島辯說：「這是兒島氏為了對付行政官而擁護司法獨立所不得不的行為，乃是防衛上的處置之正當行為，因此不能說是違背裁判所構成法第 143 條的精神。」¹⁰⁷ 田畑忍教授則是從大審院長的司法行政監督權的行使角度，來區分干涉行為及干涉排除行為，而後者則是正當的權限行使。¹⁰⁸ 歷史學者家永三郎也為之辯解：

一是此乃為了防止國務大臣干涉法官之破壞司法獨立的防衛行為；二是此乃急迫事件，但卻沒有其他及時有效方法之不得已行為；第三是因為這是在法益的侵害以及保護之比較下而作出的行為，所以是具備超法規的阻卻違法之性質。

109

¹⁰³ 本案源於自衛隊為了建設長沼基地而解除國有保安林所引發的自衛隊違憲訴訟。札幌地方法院，1973 年 9 月 7 日判決。參見《判例時報》，第 712 號，頁 219；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1982 年 9 月 9 日判決。參見《民事裁判集》，第 36 卷 9 號，頁 1679。

¹⁰⁴ 第四編第 143 條「此篇所揭示前述各條規程是不許對在裁判上執行職務之判事的裁判權有所影響或限制」。參閱《裁判所構成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

¹⁰⁵ 森田友喜，〈兒島惟謙にみる司法權の獨立と裁判官の選任制度—司法權獨立の一考察〉，《沖大法學論叢》，2 卷 1 號（1976），頁 113-114。

¹⁰⁶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權の獨立（2）—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 43-44。

¹⁰⁷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學的意味〉，頁 206-207。

¹⁰⁸ 田畑忍，〈裁判に対する政府の干涉と大審院長による干涉排除の峻別家永三郎教授の『兒島惟謙と大津事件』に対する一つの反論として〉，《同志社法學》，18 卷 2 號（1966），頁 29。

¹⁰⁹ 森田友喜，〈兒島惟謙にみる司法權の獨立と裁判官の選任制度—司法權獨立の一考察〉，頁 114。

其次就是法律內在的實體面上爭議，也就是應該適用刑法的對皇室的罪或是普通殺人罪。表面看來前者是受政治家及三好檢事總長所支持，而後者則是兒島院長及多數法界人士的主張。可是如果單從法律的解釋面來看，許多主張對皇室罪的人士也不得不認為應以普通殺人罪才是正確的。例如陸奧農商務大臣及三好檢事總長最初也是主張普通殺人罪，甚至松方首相聽了兒島院長的說詞後也認為法律解釋應當如此，似乎暗示著引用普通殺人罪的正當性。¹¹⁰

不過另一方面，誠如三好檢事總長所說：「本邦人士對外國君主皇族的加害行為，其危害所及乃關係重大，傷害我國的安寧結果是非比尋常殺人罪。」¹¹¹尤其在當時刑法的量刑上，法官是極受限制。而且除了明治天皇曾做出將尼古拉王儲視為己身的安全保證，日本政府更與俄國方面有要更為嚴厲地處罰犯人的約定，因此從法律解釋上，未必能完全否定引對皇室罪以處死。¹¹²這也就是當時的俄羅斯公使崔維其曾對外務大臣青木周藏（1844－1914）提到，若是尼古拉皇太子訪日期間遇到無禮的行為，由於日本沒有相關罰則，所以要求日本以勅令制定之。而青木則答應以對日本皇室的相關法律處置，後來在內閣會議中也提出「根據外交情況，日本法律不能處置之事，則有頒布勅令解決之承諾」的報告。¹¹³

依照國際慣例，就算受害者是外國人，原則上也應以犯罪所在地的法律處罰犯行，這也是該國政府的義務。雖然受害者是外國的君主或是其他要人，恐會引起政治紛爭，但也無需超越法律而處以更重的刑罰。只是兩國政府若對此問題有特別約定的話，可能要另當別論，而這就涉及到上述青木外務大臣與俄羅斯駐日公使的約定問題。首先是兩國的協定，並非只是口頭約定。簽訂的形式雖然只是備忘錄，但日本方面是具有國家代表資格的外務大臣，且在事後還經內閣的再確認，並告知俄國公使要加以履行，所以被認為日本政府並非完全不受此約定拘束。¹¹⁴雖說狀況不完全相同，但如砂川案中所涉及的「行政協定」，也未必需由國會審議通過。¹¹⁵

¹¹⁰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頁 211。

¹¹¹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東京：築地書店，1944），頁 107-109。

¹¹²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頁 212。

¹¹³ 御廚貴，〈日本の近代 3：明治国家の完成 1890～1905〉（東京：中央公論社，2001），頁 222-223。

¹¹⁴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 152-153。

¹¹⁵ 砂川案指的是因為抗爭美軍擴建立川機場而引發之訴訟。最高法院大法庭，1959 年 12 月 16 日判決。參見《刑事裁判集》，第 13 卷 13 號，頁 3225。

其次是密約問題，這也是飽受兒島院長所批判。不過既然是秘密約定，通常就非經議會公開通過，但這也是國際上的普遍現象。戰後美國為了將沖繩交付日本，最初也是以密約方式，後來被記者與在野黨洩漏後，還演變成新聞自由與國家秘密衝突之西山記者案，但最後洩密的記者也未因此而免責。¹¹⁶

除了日俄雙方的官方約定外，天皇也做了保證，若沒有相應措施的話，難免引起國際爭議，並影響神聖不可侵的天皇威望。只可惜當時日本雖然努力步向國際社會，可是仍然缺乏國際法的人才，如大津事件前夕，身為日本最重要的法律與官僚人才培育的帝大法科，居然沒有專門的國際法教授。當時的國際法是由英國法教授鳩山和夫（1856－1911）與行政法教授斯波淳六郎（1861－1931）兼任，直到事件發生的當年，才由國外學成歸國的松方首相之子幸次郎（1865－1950）兼任，隔年又由外務省參事官秋月左都夫（1858－1945）兼任。因此在當時也被認為法科教授在關注大津事件時，缺乏從國際法角度來考量。¹¹⁷

在法律的適用上，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津田的謀刺行動並沒有成功，而且只是造成尼古拉太子的輕傷而已。津田三藏未必是要奪取其性命，所以也有可能以刑罰更輕的刑法 301 條毆打傷害罪論斷。¹¹⁸ 最初讓山田法務大臣擔心的就是大津法院否定犯人的殺人意圖，僅依此判處幾年徒刑的話，實在會造成日本在外交上的難堪，不過司法省參事官倉富勇三郎（1853－1948）等官員卻認為犯人是配劍砍人，所以判斷法院不可能否定其殺意。¹¹⁹ 當然以現代刑法的觀點，如此見解是有所爭議，而在當時對於毆打創傷罪，也有將毆打與創傷進行區分的看法，只要依照其中一項造成結果就可斷罪，¹²⁰但多數學說還是支持需因毆打造成創傷論罪。¹²¹

¹¹⁶ 西山記者案指的是因為洩漏美日間的沖繩密約而引發的訴訟。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1978 年 5 月 31 日判決。參見《刑事裁判集》，第 32 卷 3 號，頁 457。

¹¹⁷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 196-198。

¹¹⁸ 第三編第一章第 2 節第 301 條「人ヲ毆打創傷シ二十日以上ノ時間疾病ニ罹リ又ハ職業ヲ營ムコト能ハサルニ至ラシメタル者ハ一年以上三年以下ノ重禁錮ニ處ス。2 其疾病休業ノ時間二十日以上ニ至ラサル者ハ一月以上一年以下ノ重禁錮ニ處ス（筆者譯：將人毆打創傷致使二十日以上時間患病或不適就職者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禁錮刑。2 其疾病休業十間達二十日者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禁錮刑。）」。參閱《刑法》（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 36 号），維基文庫 WIKISOURCE。

¹¹⁹ 小寺彰、岩沢雄司、森田章夫編，《講義國際法第 2 版》（東京：有斐閣，2010），頁 70。

¹²⁰ 井上操，《刑法述義》，第 3 篇（東京：井上操，1883），頁 60。

¹²¹ 芥川正洋，〈暴行罪における「暴行」概念の史的展開—立法・学説史にみる「暴行」の多元性〉，《早稲田法学会誌》，67 卷 1 號（2016），頁 10。

就算津田三藏真要殺死尼古拉太子，在當時的日本刑法裡，也是存在著預謀殺人（292 條）與故意殺人（294 條）的區別。¹²² 也就是在殺人罪的判斷上，不只在於兇手是否有殺害的意圖。根據當時的刑法教科書解釋，還得區分是「起了殺人意圖後到實行之際多少還存有熟慮的時間」，還是「因為激動而突發殺意以致人於死」；¹²³ 或是簡單來講，犯人的殺意是否有「謀慮計畫」。¹²⁴

此一原則在當時歐洲也被普遍接受，例如當時日本刑法的仿效對象之法國刑法（1810），¹²⁵就有故意殺人（第 295 條）與預謀或埋伏殺人的謀殺罪（第 296 條）之分；而且刑法 297 與 298 條也有對預謀與埋伏做定義。後來的德意志帝國刑法（1871）也有因為是否「熟慮」而區分謀殺罪與故殺罪（第 211、第 212 條）。¹²⁶

因此，犯人要真的有預謀殺害才會處以死刑，若只是一般的故意殺人則可只處以無期徒刑。而故意殺人未遂者減一級的話，只是有期徒刑，且後來滋賀縣政府所編輯的報告中，更否定津田三藏犯刑是有計畫性的。¹²⁷

另外在超越法律的爭議上，也就是關於國家價值與法律價值孰輕孰重？尤其當國家面臨重大危機時，是否可有超越法律的做法？而這就涉及到國家理性與國家緊急權的概念。¹²⁸ 的確在國家理性下，國家的維持與發展才是首要，例如馬基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曾主張為達此目的，就算明顯違反道德的政策，君王也要毫不猶豫的執行，¹²⁹此一理論頗符合戰前日本的國策。而對於國家緊

¹²² 第三編第一章第 1 節第 292 條「豫メ謀テ人ヲ殺シタル者ハ謀殺ノ罪ト爲シ死刑ニ處ス（筆者譯：預謀而殺人者以謀殺罪處死刑）」、第 294 條「故意ヲ以テ人ヲ殺シタル者ハ故殺ノ罪ト爲シ無期徒刑ニ處ス（筆者譯：故意而殺人者以故殺罪處無期徒刑）」。參閱《刑法》（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 36 号），維基文庫 WIKISOURCE。

¹²³ 磯部四郎，《刑法講義下》（東京：八尾書店，1893），頁 821、837。

¹²⁴ 井上操，《刑法述義》，第 3 篇，頁 18。

¹²⁵ 明治的舊刑法主要以 1810 年的法國刑法為基礎，再參考德國、比利時、義大利等歐洲國家的刑法，並基於博瓦索納德（Gustave Boissonade, 1825—1910）的折衷主義刑法理論所編纂的草案而制定。山中永之佑編，《新・日本近代法論》，頁 167。

¹²⁶ 1810 年法國刑法 295 條「故意而殺人乃故殺」；296 條「預謀或潛伏而蓄意殺人乃謀殺」；297 條「所謂預謀，乃行為前就對特定人或是應該會發現及遭遇者之身體有加害的計畫；298 條「所謂潛伏，是指為了將人殺害或是施加暴行，在一處或多處花費時間等待該人。」而 1871 年德國刑法 211 條「蓄意殺人者，其人是經熟慮而實行殺人情況，則以謀殺罪處死刑」；212 條「蓄意殺人者，其人並非經熟慮而實行殺人時，則以故殺罪處五年以上刑期」。山本光英，《ドイツ謀殺罪研究》（東京：尚學社，1998），頁 204、207。

¹²⁷ 新井勉，《天津事件—司法權獨立の虚像》，頁 70-71。

¹²⁸ 宮澤俊義，〈天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頁 214。

¹²⁹ 久米郁、川出良枝、古城佳子、田中愛治、真淵勝，《政治学》（東京：有斐閣，2003），頁 93。

急權，明治憲法對此有著詳細的規定，包含第 8 條的緊急勅令、第 14 條的宣告戒嚴、第 13 條的非常大權以及第 70 條的緊急財政措施。¹³⁰ 畢竟當國家面對戰爭、內亂、恐慌及大規模自然災害時，平常的法律已無法對應下，一時地停止法律秩序之非常行動，並非不可理解之事。

而日本政府若真要判處犯人死刑，除了發布戒嚴外，也有受兒島院長所肯定的以緊急勅令來解決。¹³¹ 雖然兒島提出以緊急勅令的事後法方式來判處津田三藏死刑的建議，也被批判是讓政府來干涉裁判，並有損其所維護的司法獨立，¹³²更是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之虞，但畢竟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大事，而緊急勅令就是為了應對特殊狀態而不得不的措施，所以連穗積陳重等一些法科教授也表贊同。¹³³

既然明治憲法存有如此多的相關規定，日本政府也曾多次利用國家緊急權應付非常時期，例如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時，就曾依照憲法 14 條發佈軍事戒嚴；在「日比谷縱火事件」（1905）、關東大地震（1923）與「二二六事件」（1936）時，¹³⁴則依憲法 8 條發佈行政戒嚴。¹³⁵ 其實在當時，除了非常大權從未頒布過，緊急勅令與緊急財政措施都需有議會的追認，¹³⁶而天皇要宣告戒嚴也要有一定的時機及區域的

¹³⁰ 第一章第 8 條「天皇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公共之災厄，因緊急之必要，在帝國議會閉會期內，發布可代法律之勅令。前項勅令，應於下次會期提出於帝國議會。若議會不承認時，政府應公布該勅令此後失其效力」、第 13 條「天皇行宣戰，媾和，及締結各種條約」、第 14 條「天皇宣布戒嚴。戒嚴之要件及效力，以法律定之」、第六章第 70 條「為保持公共安全，有需緊急費用之際，而因內外之情形，政府不能召集帝國議會時，得依勅令，為財政上必要之處分。前項情形，須於下次會期，提出於帝國議會，請求承認」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¹³¹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頁 222。

¹³² 楠精一郎，〈兒島惟謙—大津事件と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頁 65；礪川全次，〈大津事件—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頁 172。

¹³³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 196-198。

¹³⁴ 日比谷縱火（燒打）事件源於日本在犧牲重大下才贏得日俄戰爭，卻簽訂令人不甚滿意的和約，於是一些反對人士群起抗議且與警察嚴重衝突，更引發了放火破壞的流血事件，政府因此發布戒嚴，並派軍隊鎮壓。又在關東地方大地震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混亂下，居然傳言社會主義分子與朝鮮人要製造暴動，結果造成對彼等的虐殺。為了壓制此一狀況，日本政府也宣告戒嚴。而二二六事件則是源於皇道派的激進青年軍官所發起的政變，在此非常時期，政府頒布戒嚴，並派軍隊嚴厲鎮壓。參閱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修，〈詳説日本史研究〉，頁 366、412、437。

¹³⁵ 第一章第 8 條「天皇為保持公共之安全或避免公共之災厄，因緊急之必要，在帝國議會閉會期內，發布可代法律之勅令。前項勅令，應於下次會期提出於帝國議會。若議會不承認時，政府應公布該勅令此後失其效力」。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譯文參閱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加藤一彦，〈大日本帝国における非常大權の法概念〉，《現代法学》，28 號（2014），頁 102。

¹³⁶ 衆議院憲法審査会事務局，〈「緊急事態」に関する資料〉，《衆憲資》，87 號（2013），頁 6。

限制。¹³⁷ 只不過國家緊急權猶如雙刃之劍，雖可解決非常時期的緊急狀態，但也常把國家帶到獨裁且危險的狀態，尤其是在沒有強力的監督情況下。而當議會失去制衡的權力之時，也就是人民與國家災難的開始，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與德國納粹獨裁興起的原因之一。然而只是因暗殺俄國皇儲而引起的緊張狀態就要行使國家緊急權，難免存有爭議，畢竟當時只是有危機的可能性而已。

陸、判決與後續

本案最初先移送至大津地方法院進行預審。根據預審的資料（1891 年 5 月 18 日）如下：

首先是犯人津田三藏的背景資料，也就是該犯人的家庭狀況，士族出身以及入藩校學習漢學與武藝，而後從軍，再轉任警察的經歷。其次就是提及犯罪的經過。第三就是指出其犯罪動機是因為不實妄想。另外也提到犯人雖然過去曾因腦充血生病，又有酒精戒斷症候群的病狀，但在治癒後並沒有留下精神病的痕跡。¹³⁸

不過因山田司法大臣指示三好檢事總長在御前會議已決定由大審院的特別法庭審理之，於是三好總長就以該案涉及刑法 116 條，下令大津地方法院檢事局停止預審，¹³⁹而後便由大審院任命七位法官審理此案。因為若是一般案件，通常會先由地方法院做審理，而後再上訴至高院，最後才是由最高法院的大審院審判。可是當案件涉及到有關對皇室的罪責時，便可直接由大審院審理。而且直到開庭的前夕，山田司法大臣等人還不放棄對承辦法官的勸服，只是法官們卻拒絕在此刻與其會面。¹⁴⁰

¹³⁷ 伊藤博文著，新譯《帝國憲法義解》，頁 52-53。

¹³⁸ 尾佐竹猛著，三谷太一郎校注，《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東京：岩波書店，1991），頁 179-183。

¹³⁹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東京：築地書店，1944），頁 28-29。

¹⁴⁰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頁 82-83。

本案的檢方由三好檢事總長及檢察官川目享一（1853—1907）擔任，谷澤龍造（1852—1918）及中山勘藏（生卒年不詳）則擔任被告的辯護律師。因為法院認為該案有危害安寧秩序之虞，所以並非公開審判。首先由檢方陳述事實，但辯方則主張本案非為對皇室的罪，所以不屬於大審院權限，卻被法庭駁回。其次是進入事實審，由於兇手是現行犯遭逮捕，所以只能認罪並對此舉表示悔意。再來就是法庭上的辯論，檢方主張對外國皇室的傷害，是影響國際關係及國家安寧，與對本國皇室傷害的危險重大性並無區別；刑法草案上原本的「日本」的文字被刪除，就是指可以適用於外國君主及皇族。但是辯方反駁說刑法的對皇室傷害罪本就僅指日本皇室；法律的不完備是另一問題，法官不可以為了補足法律的不完備而自行引用法律；另外又舉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巴黎博覽會時（1867）也曾遭遇暗殺未遂，犯人僅以一般謀殺罪處罰；至於因為危害大小不同而施以不同的處罰，應該是立法的問題。¹⁴¹

最後由堤正巳等七位法官做出判決如下：

被告三藏不顧當時任職滋賀縣巡查身分，居然妄信此次俄羅斯（露西亞）國太子殿下來遊我邦並非只是尋常之漫遊，因此私下懷有不快之念。就在明治二十四年五月十一日殿下遊覽滋賀縣之際，被告三藏正在大津町三井寺境內擔任警衛，竟在此際起意要將殿下殺害。於是窺探時機，被告三藏就在同所大字下小唐崎町負責警衛時，趁著該日下午一時五十分左右，殿下剛好經過該地，認為機不可失且不再有其他時間可達其目的，於是拔出配劍向殿下頭部連砍兩次而造成傷害，卻為殿下所閃避，於是被告為達其意而繼續追殺，幸好為他人所阻，使其目的不能達成。右述事實是基於被告自白，證人向畑治郎之陳述，大津地方法院預審法官所做成的檢證調書，證人北賀市市太郎、西岡太郎吉、醫師野並魯吉、巡查菊地重清之預審調書及沒收之刀，因此證據充分。依照法律，其所為是謀殺未遂犯罪。根據刑法二九二條、一一二條及一一三條，處被告三藏無期徒刑，犯罪所用之刀交付滋賀縣廳。¹⁴²

結果大審院只以謀殺未遂罪判處無期徒刑，表面上司法終究抵擋來自政治的壓力。當時日本的新聞多是持著肯定的態度，例如《東京日日新聞》就認為讀其判決

¹⁴¹ 緒方真澄，〈兒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獨立（3）——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頁 63-64。

¹⁴² 大津地方法院之大審院法庭 1891 年 5 月 27 日判決，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頁 126-129。

文深感「大審院法官是能保其獨立，守其公正，毫無私見，全依法律斷罪。」¹⁴³ 兒島院長稱許如此判決是能鞏固法權，並將之告訴了西鄉內務大臣，只見西鄉很失望的說：「因此可能引發戰爭，為了救助兇惡的津田三藏之命而破壞我國家安寧」；但兒島也只能回答戰爭乃閣下等將軍之事。¹⁴⁴

不過該案雖沒有遵循與俄國約定，以緊急命令權等更嚴厲方式處死犯人，仍然留下不少法律疑問。首先是若以故意殺人未遂處罰的話，應該以地院為一審再上訴，而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司法省則為之辯解，稱上級法院本來就有直接代下級法院判決的權力；後來升任為樞密院議長的倉富永三郎除了強調大審院的權限外，更認為被告再上訴也沒有減刑的可能。¹⁴⁵ 其次是依照前述的滋賀縣政府所編輯的報告，犯人並非沒有適用故意殺人未遂的空間，因此是有因改用不同法條而減刑的可能性。也就是津田三藏所傷及的若是一般人民的話，從引用法條、審判程序到量刑都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法院還是因為被害者是尼古拉王儲而有政治考量，並做出差別待遇。另外受人詬病的是，法院審理雖是集中在犯人有無殺害意圖與是否預謀，但是開庭只有一次，而辯論是非公開且不足兩小時，不能不說是審理不夠充分。¹⁴⁶

本案跟後來暗殺李鴻章（1823－1901）不成卻也以謀殺未遂判處無期徒刑的小山豐太郎（1869－1947）案相對照，¹⁴⁷卻也有些異同處。雖然伊藤博文對此暗殺事件也是非常震怒，但是日本國內並沒有歇斯底里的恐慌，這除了李鴻章並非皇族外，更重要的是當時日本面對的清朝已是戰敗國，顧忌的只是國際觀感，已非如長崎水兵事件時（1886），¹⁴⁸清朝還有可以威嚇日本的北洋艦隊，這也是國際現實的反映。相較於小山後來被特赦放出，津田三藏雖然逃過死刑，並被移送到北海道的釧路監獄，及受免除巡查職務、取消被頒發之勳章等處分，卻於當年 9 月 24 日，在治療

¹⁴³ 參閱《東京日日新聞》，1891 年 5 月 29 日報導。收錄於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新聞を中心として》，頁 256。

¹⁴⁴ 沼波瓊音，《兒島惟謙：護法の神》，頁 188。

¹⁴⁵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 210、212。

¹⁴⁶ 新井勉、燕山巖、小柳春一郎，《ブリッジブック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頁 171。

¹⁴⁷ 山口地方法院 1895 年 3 月 30 日判決。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新聞を中心として》，頁 279-280。

¹⁴⁸ 本案源於出訪長崎的北洋水師因在當地尋歡取樂並與當地警民發生衝突，後來在英德等國的調停下，才以日方付出遠高於清朝的撫卹金結束此一外交糾紛。參閱王家儉，〈中日長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5 期（1977），頁 335-378；橋本秀一，《明治長崎清國水兵暴行事件》（東京：ブックコム，2020）。

感冒時引發支氣管肺炎病逝。¹⁴⁹ 只是三十七歲的壯年便結束了一生，使得此事件又增添一點謎團。

其實當時民間流行的「恐俄症」並非是空穴來風，後來俄羅斯對東北亞的逐步進逼，除了再再地顯示其野心，也與日本帝國在利益上產生衝突。因此津田三藏也誠如小泉八雲（1850—1904）所說的是「過頭的忠義」罷了；¹⁵⁰ 而津田在法庭上也辯稱是基於不滿俄國企圖蠶食日本而引發的愛國心。¹⁵¹ 其實津田的刺殺尼古拉雖說是一種極端偏激的行為，卻是要賭上生命且不會為自己帶來任何利益，可見得要擁有多大的激憤與勇氣。然而在事發最初，因為日本已陷於一種歇斯底里的狀況，難以冷靜地看待此一事件。但暗殺事件發生不久後，輿論又產生變化，尤其在排外的民族主義煽動下，越來越多人認為津田是犧牲自己奉獻給君國的志士，並批判政府的枉法行為。¹⁵² 不過因為當權者的立場，津田終究無法獲得如安重根（1879—1910）、尹奉吉（1908—1932）般的評價。

事發後，除了滋賀縣知事冲守固（1841—1912）與該縣警部長齋藤秋夫（生卒年不詳）被免職外，¹⁵³內閣方面，文部大臣芳川顯正（1842—1920）、山田司法大臣、青木外務大臣及西鄉內務大臣也引咎辭職。¹⁵⁴ 一些不滿大津裁判的閣員，甚至皇族也抨擊兒島等法官是不忠不臣，且犯違勅之大罪。¹⁵⁵ 雖然西鄉等閣員因此而辭職，但並不意味著他們從此退隱。如芳川與青木後來又再度入閣，而西鄉在不久後還獲得晉升。反倒是山田在辭職後雖也被任命為樞密顧問官，但很快地就因病過世。

而日本駐俄公使西德二郎（1847—1912）在事發後，即刻接到來自青木外務大臣的電報，¹⁵⁶西德公使於是連番地拜會俄國外交部長尼克萊·吉爾斯（Nikolay de Giers, 1820—1895）並報告詳情以求得諒解；此外更積極收集俄國的反應，尤其擔

¹⁴⁹ 〈無期徒刑囚津田三藏病死景況報告（1891年10月6日）〉，高第23號，受第12427號（收錄於外務省編，《再版日本外交文書第24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4），頁199。

¹⁵⁰ ドナルド・キーン著，《明治天皇下卷》，頁140。

¹⁵¹ 兒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頁89-90。

¹⁵² 礪川全次，《大津事件と明治天皇—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頁185-186；尾佐竹猛，《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頁198。

¹⁵³ 宮内庁，《明治天皇皇紀》第七，1891年5月16日，頁826。

¹⁵⁴ 遠山景福，《議會政治年鑑》（東京：金鈴社，1931），頁45-46。

¹⁵⁵ 大場茂馬，《湖南事件と大浦底護事件》（東京：大場茂馬，1916），頁88。

¹⁵⁶ 〈露國皇太子容態通報之件〉，1891年5月12日。外務省編，《再版日本外交文書第24卷》，頁130-133。

憂俄國輿論可能的不滿情緒，並連番向外務省報告。不過後來俄國政府與新聞對於此案的結果少有不平，¹⁵⁷也就是從沙皇到一般民眾，對日本政府的處理還可接受，才讓爭議平息。¹⁵⁸ 尤其俄羅斯方面對此判決卻只回答「若依貴國法律處置的話，就已滿足」，並且未向日本請求賠償，伊藤博文也只能慶幸地認為此次是國家之幸。

雖然本次的暗殺未遂案件未達到政府要判處犯人死人的要求，卻也沒有因此演變為嚴重的國際問題，只是兩國正在進行的條約修正還是因此而停頓，¹⁵⁹對日俄的外交工作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另一方面，此案雖受到西方國家的一定評價，而日本政府也是對此非常關注，並讓駐外使館報告當地反應，¹⁶⁰但因青木外務大臣的辭職，而中斷了關稅協定與法權回復等談判。¹⁶¹

數年後尼古拉繼位為沙皇，日俄關係確實日益惡化，除了甲午戰後的三國干涉還遼外，日俄戰爭還是爆發。雖然不能說日俄衝突是源於大津事件，畢竟俄羅斯的對東北亞野心是難以止歇，但尼古拉即位後確實改變了俄國的對日政策，且傳言該事件深刻地影響尼古拉對日本人之觀感。¹⁶² 不過俄國在遠東的過度擴張，並非英國所樂見，因此才有英日同盟以為節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在歷經了「臥薪嘗膽」，終於在日俄戰爭擊敗此一「北門的強敵」。只是相較於甲午戰爭，日本無論在人力或財力上損失更多，同是戰勝國的日本，在樸茨茅斯條約上卻獲得比馬關條約更少的成果，尤其並無從俄國方面獲得任何賠償金，後來因此還引起人民的不滿而導致「日比谷縱火事件」。當然這

¹⁵⁷ 〈大審院ノ判決ニ關スル件〉，1891年6月1日與6月3日；〈露國皇儲遭難ニ關シ任國政府ヘノ處理報告ノ件三〉，1891年6月3日；〈露國皇帝陛下ノ思召傳聞報知ノ件〉，1891年6月6日；〈津田犯罪人處分ニ付露國政府満足ノ件〉，1891年6月10日。外務省編，《再版日本外交文書第24卷》，頁180-183。

¹⁵⁸ 沼波瓊音，《兒島惟謙：護法の神》，頁191。

¹⁵⁹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2 條約改正問題》（東京：鹿兒島研究所，1970），頁224。

¹⁶⁰ 如獨國駐劄西原寺公使的〈大津凶變後ノ任國感觸報告ノ件〉，1891年5月21日；蘭國駐劄加藤臨時代理公使的〈大津事件ニ關シ任國感觸報告之件〉，1891年5月28日；佛國駐劄大山臨時代理公使的〈大津凶變ニ關シ任國感觸報告ノ件〉，1891年5月29日；在英公使館的〈大津凶變後英國ノ輿論情報ノ件〉；奧國駐劄渡邊公使的〈大津事件ニ關シ任國感觸報告之件〉，1891年6月5日；蘭國駐劄加藤臨時代理公使的〈大津事件ニ關シ任國感觸報告之件〉，1891年5月28日；米國駐劄佐藤臨時代理公使的〈大津凶變ニ關シ任國模樣情報ノ件〉，1891年6月6日。外務省編，《再版日本外交文書第24卷》，頁158-160、170-172、176-178、178、184-185、188。

¹⁶¹ 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修，《詳説日本史研究》，頁355。

¹⁶²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頁172。

也是日本政府基於現實的考量。

在兒島院長的堅持下，雖擋住了來自政治的壓力而維持司法自主，但畢竟兒島院長確實與當時的許多權力者產生嫌隙。就在隔年，兒島便因司法官弄花事件，¹⁶³辭去大審院長一職。¹⁶⁴事隔多年後，曾任第十一任大審院長的平沼騏一郎（1867—1952）在回憶此事時，曾將之當成權力與地位之爭，難免被認為是對大津案的報復。¹⁶⁵就在此際，兒島著手寫下了此一事件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兒島在辭掉大審院長不久後又被任命為貴族院勅選議員，雖然兒島也被推薦擔任要職，但卻屢遭反對，傳言幕後的黑手就是西鄉從道。¹⁶⁶不過兒島途中又辭去貴族院議員身分而回本籍地愛媛縣競選眾議院議員，並且順利當選，但最後又再回歸成為貴族院議員。¹⁶⁷

兩位阻止津田三藏行刺的車伕因功被尼古拉皇太子「詔之軍艦，親賜金二千五百圓，手授聖安那勳章，並宣告賜年金千圓。」¹⁶⁸但後來俄羅斯與日本發生戰爭，而俄羅斯帝國又因革命而滅亡，且尼古拉二世也以悲劇收場。

柒、影響與結論

對於大津事件，一般注重的是司法獨立的議題上。雖然兒島院長的做法難免有所爭議，但也被視為是不得已情況下的便宜舉動。因此戰前的日本司法在深受政治影響的同時，這種抗拒來自政治壓力而維護司法獨立的傳統，也對部分的後進司法官產生影響。尤其當軍國主義盛行的戰爭時期，當權的軍人、政客也試圖借助法院來遂行其政治目的，然往往會遭到司法人員的抗拒，例如判決戰時「翼贊選舉」（1942）中的鹿兒島第二選區中因違法選舉活動而無效之大審院法官吉田久（1884

¹⁶³ 弄花事件指的是因為兒島院長與大審院法官有參與花禮賭博之嫌而被送交懲戒法院，雖然所有人都被判免訴處分，但還是在山縣法務大臣的運作下，兒島還是辭職。新井勉，《大津事件～司法權獨立の虛象》，頁207。

¹⁶⁴ 內務省官報局，《官報》，1892年8月24日，2748號，頁221。

¹⁶⁵ 礪川全次，《大津事件—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頁263-264。

¹⁶⁶ 沼波瓊音，《兒島惟謙：護法の神》，頁264。

¹⁶⁷ 內務省官報局，《官報》，1905年12月14日，6738號，頁506。

¹⁶⁸ 宮內庁，《明治天皇紀第七》，1891年5月18日，頁828。

—1971)；¹⁶⁹ 抗議軍人出身的首相東條英機（1884—1948）試圖施壓於司法機關的廣島高院長官細野長良（1883—1950）等。只是這畢竟少數，日本弱勢的司法機關，絕非二次戰前屢以違憲判決，來阻擾羅斯福總統的新政之權的美國法院可比。

到了戰後，在強調國民主權與人權保障的新憲法下，廢除司法需以天皇名義行使之的規定外，又在第 76 條直接要求法官的獨立判案；而且也在第 78 條保障除了因身心障礙而無法行使職務外，非經彈劾不能罷免。¹⁷⁰ 也的確戰後的日本司法，更能保持獨立，並獲得人民的高度信賴，例如戰後初期之英國水兵的神戶搶劫案（1952），從神戶地院到大阪高院都能不顧英國政府的抗議而判刑，以宣示基於屬地主義的裁判管轄權。¹⁷¹

然而司法獨立之路在實際上也未必真的坦途無礙，尤其身為終審法院的最高法院法官雖然在形式上仍得接受「國民審查」的投票（戰後憲法 79 條），¹⁷²但實際上罷免率甚低，至今仍無被罷免的法官，再加上法官任命無須議會通過，使得長期執政的保守自民黨政府在最高法院法官的選用上，常會偏向支持政府政策的保守派法官。當中最受爭議的莫過於憲法九條和平主義的問題上，最高法院從未有過違憲判斷。除了上述的長沼案，最受批判的還是有關美軍基地的砂川案，在違憲的「伊達判決」後直接跳躍上訴到最高法院，¹⁷³沒想到在此際，除了外務大臣藤山愛一郎（1897—1985）等的政治壓力，最高法院院長官田中耕太郎（1890—1974）居然也在此際私下會見美國大使麥克阿瑟二世（Douglas MacArthur II, 1909—1997），¹⁷⁴結果最高法院以具有高度政治性之「統治行為」論取消地院的違憲判決。¹⁷⁵ 這比起

¹⁶⁹ 大審院第三民事部 1945 年 3 月 1 日判決，參閱矢澤久純、清永聰，《戰時司法の諸相—翼賛選挙無効判決と司法権の独立》（廣島：溪水社，2011）。

¹⁷⁰ 第六章第 76 條「所有法官依良心獨立行使職務，只受本憲法及法律的拘束」、第 78 條「法官除因身心故障經法院決定為不適於執行職務者外，非經正式彈劾不得罷免。法官的懲戒處分不得由行政機關行使之」。參閱日本國政府編，日本國駐華大使館譯，《日本國憲法》，維基文庫。

¹⁷¹ 此案源於停泊於神戶港的英國軍件水兵居然登陸搶劫，雖然與英國政府對此案有所爭議，但日本法院還是堅持具有裁判權而判刑。內山正雄，〈第二神戶水兵事件〉，《慶應義塾創立一二五周年紀念論文集：法學部政治學關係》（1983），頁 395-434。

¹⁷² 第六章第 79 條「最高法院法官之任命，在其任命後第一次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時交付國民審查，自此經過十年之後第一次舉行眾議院議員總選舉時再次交付審查，以後准此」。參閱日本國政府編，日本國駐華大使館譯，《日本國憲法》，維基文庫。


¹⁷³ 東京地方法院，1959 年 3 月 30 日判決。參見《判例時報》，180 號，頁 2。

¹⁷⁴ 辻元清美，〈砂川事件最高裁判決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司法権の獨立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衆議院質問本文情報》，質問第 550 號（1998）。

¹⁷⁵ 最高法院大法庭，1959 年 12 月 16 日判決，參見《刑事裁判集》，13 卷 13 號，3225 頁。

大津案開庭前，承辦法官拒絕了山田司法大臣等人的面會，似乎有著後退的感覺。此事保密數十年後才公開，¹⁷⁶結果引起一片譁然。另外，前述的「平賀書簡事件」後之福島法官卻被以違反裁判官彈劾法第2條第1項的「職務上之義務」為由，¹⁷⁷反而受到緩追訴的處分，而當時也因「青法協」問題而引發司法危機。¹⁷⁸

其實就連日本的戰後憲法雖然在宮澤俊義主張的「八月革命說」等理論下而普遍承認其正當性，但卻難以否認這是在美國的強加下所制定。而且從憲法的廢除軍備之和平主義到「違憲」的恢復軍力，都是有美國的影子。既然在包含憲法議題的重大政策上，政府部門都難以擺脫美國的影響，¹⁷⁹司法部門實難完全置身度外。尤其從戰後憲法9條的裁判上，就可知國家與法律價值間的權衡之困難。更何況是在大津案的十九世紀末，正是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強國往往無視小國的法律，明治時期的政界元老意圖干涉司法以保全國家也非不可理解之事。若是對事情稍有處理不當，讓俄羅斯借題發揮，提早開打了日俄戰爭，或是對日本要求巨大的賠款、割地，應該也會影響明治維新的成果，如此就可能改變了日本，甚至是東亞的歷史。

另一方面，表面上在兒島院長的堅持下，雖然阻擋來自政府判處犯人死刑的要求，然而從大審院的審判程序及引用法條還是充滿瑕疵。不過在強調司法獨立的現代，高度影響政治的裁判都難免政治考量，更何況在立憲之初的當時，兒島院長及承辦該院的大審院法官可堅持到這樣的程度，已實屬難能可貴。只是俄羅斯假若藉機挑釁，甚至開戰，恐怕此案又是另一種評價了。

¹⁷⁶ 參閱布川玲子、新原昭治，〈砂川事件「伊達判決」と田中耕太郎最高裁長官関連資料—米國務省最新開示公文書（2013.1.16 開示）の翻訳と解説—〉，《法學論集》，71 號（2013），頁 15-24。

¹⁷⁷ 第2條第1項「職務上の義務に著しく違反し、又は職務を甚だしく怠つたとき（筆者譯：顯著違反職務上的義務，或是對職務嚴重怠惰時）」。參閱《裁判官彈劾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137號），e-GOV 法令檢索（<https://reurl.cc/DZYxbe>），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¹⁷⁸ 青年法律協會（青法協）是一標榜和平、民主主義的法律團體，並且反對美日安保，而福島法官正是該協會會員。由於最高法院的石田和外長官及岸盛一事務總長都明言法官不該參與具有特定政治色彩的團體，就是有指責該團體的意味，而且也有一些該團體成員被拒絕任職司法官員。參閱君塚正臣，〈裁判官の独立—『司法権・憲法訴訟論』補遺（2）〉，《横浜国際社会科学研究》，23 卷 1 號（2018），頁 24-26。

¹⁷⁹ 戰後的不少日本首相曾經因為與美國政策背道而馳後就因故下台，如鳩山一郎在 1956 年的冷戰時局下恢復與蘇聯邦交後就內閣總辭；石橋湛山在主張對美自主路線後，僅在位六十五天就因病辭職；蘆田均在提倡美軍的「有事駐留」案後，就因昭和電工事件下台；佐藤榮作在違反與尼克森總統的纖維出口規範約定後，就結束其七年半多的長期政權；竹下登則是拒絕美國的要求以增加日本的「防衛責任」後，就因瑞克魯特事件下台。另外，田中角榮眾多皆知的是趕在美國之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下台後就因洛克希德案官司纏身。孫崎享，《アメリカに潰された政治家たち》（東京：小学館，2012），頁 210-217。

徵引書目

一、古籍

- (奈良) 舍人親王，《日本書紀三》，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貞、大野晋校注，東京：岩波書店，1995。
- (平安) 大江匡房、藤原實兼，《江談抄》，收入黑川真道編，《國史叢書》，東京：友文社，1914。
- (平安) 菅野真道，《續日本紀後篇》，收入《新訂增補國史大系》，第12卷，東京：吉川弘文社，1984。
- (平安) 藤原良房，《續日本後紀》，收入《國史大系》，第3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897。
- (南北朝) 北畠親房，《神皇正統記》，宮地直一校注，東京：改造社，1929。
- (室町) 瑞溪周鳳，《善鄰國寶記》，收入近藤瓶城編，《改定史籍集覽》，21冊，東京：近藤活版所，1901。

二、專書

(一) 中文

- 朱憶天，《康有為的改革思想與明治日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 柴松霞，《出洋考察與清末立憲》，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 韋伯，《支配的類型》，康樂編譯，臺北：允晨文化，1985。

(二) 日文

- ドナルド・キーン著，角地幸男譯，《明治天皇下卷》，東京：新潮社，2001。
- 山中永之佑編，《新・日本近代法論》，東京：法律文化社，2002。
- 山本光英，《ドイツ謀殺罪研究》，東京：尚學社，1998。
- 山本草二，《新版國際法》，東京：有斐閣，1994。
- 久米郁、川出良枝、古城佳子、田中愛治、真淵勝，《政治學》，東京：有斐閣，2003。
- 小寺彰、岩沢雄司、森田章夫編，《講義國際法第2版》，東京：有斐閣，2010。
- 小宮一夫，〈日本最初の政党内閣一隈板内閣の明暗〉，收入鳥海靖編，《近代日本の転機—明治・大正編》，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
- 小林直樹，《新版憲法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1。
- 小島德彌，《明治以降大事件の真相と判例》，東京：教文社，1934。
- 大場茂馬，《湖南事件と大浦庇護事件》，東京：大場茂馬，1916。
- 井上操，《刑法述義第3篇》，東京：井上操，1883。
- 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修，《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1998。

- 日高恒太朗，〈大津事件〉，佐藤實編，《天皇・皇室事件史データファイル》，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2，頁 26-27。
- 田岡良一，《新版大津事件の再評価》，東京：有斐閣，2001。
- 田畑忍，《児島惟謙》，東京：吉川弘文館，1963。
- 平野晨，《明治大正昭和歴史資料全集暗殺篇》，東京：有恒社，1932。
- 矢澤久純、清永聡，《戦時司法の諸相—翼賛選挙無効判決と司法権の独立》，廣島：溪水社，2011。
- 池井優，《増補日本外交史概説》，東京：慶応通信株式会社，1994。
- 坂井邦夫，《明治暗殺史：新聞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啓松堂，1933。
- 佐佐木克，《日本の歴史 17：日本近代の出発》，東京：集成社，1992。
- 佐藤幸治，《新版憲法》，東京：青林書院，1990。
- 吉村昭，《ニコライ遭難》，東京：新潮社，1996。
- 伊藤博文著，日本國學振興會譯註，《新譯帝國憲法義解》，東京：日本國學振興會，1938。
- 尾佐竹猛，三谷太一郎校注，《大津事件：ロシア皇太子大津遭難》，東京：岩波書店，1991。
- 児島惟謙，《大津事件手記》，東京：築地書店，1944。
- 笹川臨風，《明治還魂紙》，東京：亜細亜社，1946。
- 沼波瓊音，《児島惟謙：護法の神》，東京：修文館，1926。
-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 1853-1972》，東京：毎日新聞社，1974。
- 孫崎享，《アメリカに潰された政治家たち》，東京：小学館，2012。
- 美濃部達吉，《日本国憲法原論》，東京：有斐閣，1948。
- 馬場恒吾，《伊藤博文》，東京：潮文社，1942。
- 楠精一郎，《児島惟謙—大津事件と明治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中央公論社，1997。
- 宮武外骨，《文明開化（4）裁判篇》，東京：半狂堂，1926。
- 高柳真三，《日本法制史》二，東京：有斐閣，1965。
- 宮澤俊義，〈大津事件の法哲学的意味〉，《憲法と裁判》，東京：有斐閣，1967。
- 渋谷謙次郎，《法を通してみたロシア国家》，東京：ヴェッジ，2015。
- 新井勉，《大津事件の再構成》，東京：お茶の水書房，1994。
- 新井勉，《大津事件～司法権独立の虚象》，東京：批評社，2014。
- 新井勉、蕪山巖、小柳春一郎，《ブリッジブック近代日本司法制度史》，東京：新山社，2011。
- 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史 2 条約改正問題》，東京：鹿児島研究所，1970。
- 滝川政次郎，《日本法制史研究》，東京：有斐閣，1941。
- 御厨貴，《日本の近代 3：明治国家の完成 1890～1905》，東京：中央公論社，2001。

- 渡邊洋三，《法と社会の昭和史》，東京：岩波書店，1988。
- 渡邊幾治郎，《明治天皇の聖徳總論編》，東京：千倉書房，1942。
- 福島重雄、水島朝穂、大出良知，《長沼事件平賀書簡—35年目の証言自衛隊違憲判決と司法の危機》，東京：日本評論社，2009。
- 橋本秀一，《明治長崎清国水兵暴行事件》，東京：ブックコム，2020。
- 磯部四郎，《刑法講義》下，東京：八尾書店，1893。
- 穂積陳重，《法窓夜話》，東京：有斐閣，1916。
- 礫川全次，《大津事件と明治天皇—封印された十七日間》，東京：批評社，1998。
- 司法省，《新律綱領・改定律例》，東京：司法省，1873。
- 外務省編，《再版日本外交文書》，第24卷，東京：日本國際連合協會，1964。
-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第七》，東京：吉川弘文館，1972。
- 衆議院憲法審査会事務局，〈「緊急事態」に関する資料〉，《衆憲資》，87號，2013。
- 遠山景福，《議會政治年鑑》，東京：金鈴社，1931。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 王家儉，〈中日長崎事件之交涉（1886-1887）〉，《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期（1977），頁335-378。
- 章瑞卿，〈日本大津事件對司法獨立思想之影響〉，《刑事法雜誌》，34卷5期（1990），頁1-35。

（二）日文

- 大庭祐介，〈明治初期の思想状況と旧刑法の意義〉，《国土館史学》，17號（2013），頁89-101。
- 内山正雄，〈第二神戸水兵事件〉，《慶應義塾創立一二五周年紀念論文集：法学部政治学關係》（1983），頁395-434。
- 内川芳美，〈大津事件の報道をめぐる統制と抵抗：明治二十四年勅令第四十六號を中心として〉，《新聞学》，4卷（1955），頁43-66。
- 北条浩、宮平真弥，〈日本近代刑法の成立過程〉，《流經法学》，9卷1號（2009），頁13-57。
- 日埜博司譯，〈ポルトガルの文人モラエスの見た大津事件と烈女畠山勇子〉，《流通経済大学論集》，31卷4號（1997），頁84-94。
- 田畑忍，〈裁判に対する政府の干渉と大審院長による干渉排除の峻別家永三郎教授の『児島惟謙と大津事件』に対する一つの反論として〉，《同志社法學》，18卷，2號（1966），頁28-41。
- 布川玲子、新原昭治，〈砂川事件「伊達判決」と田中耕太郎最高裁長官関連資料—

- 米國務省最新開示公文書（2013.1.16 開示）の翻訳と解説―〉，《法学論集》，71 號（2013），頁 15-24。
- 加藤一彦，〈大日本帝国における非常大権の法概念〉，《現代法学》，28 號（2014），頁 95-121。
- 池田眞朗，〈日本法学教育史再考：新世代法学部教育の探求のために〉，《武蔵野法学》，5-6 號（2016），頁 45-82。
- 芥川正洋，〈暴行罪における「暴行」概念の史的展開―立法・学説史にみる「暴行」の多元性〉，《早稲田法学会誌》，67 卷 1 號（2016），頁 1-51。
- 君塚正臣，〈裁判官の独立―『司法権・憲法訴訟論』補遺（2）〉，《横浜国際社会科学研究》，23 卷 1 號（2018），頁 19-58。
- 栖原学，〈ロシアの市場経済と法文化〉，《経済科学研究科紀要》，31 號（2001），頁 91-106。
- 森田友喜，〈児島惟謙にみる司法権の独立と裁判官の選任制度―司法権独立の一考察〉，《沖大法学論叢》，2 卷 1 號（1976），頁 113-114。
- 新井勉，〈大津事件における立憲制の危機〉，《日本法学》，79 卷 4 號（2014），頁 1-32。
- 緒方真澄，〈児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1）―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経済論叢》，43 卷 5 號（1970），頁 1-10。
- 緒方真澄，〈児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2）―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経済論叢》，51 卷 1-2 號（1978），頁 36-51。
- 緒方真澄，〈児島惟謙の法思想と司法権の独立（3）―大津事件を中心として〉，《香川大学経済論叢》，51 卷 3-4 號（1978），頁 52-69。

四、政府相關資料

- 〈佐田白茅外二人帰朝後見込建白（1870 年 2 月 25 日）〉，《公文録・305 卷・朝鮮講信録》，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蔵，公 01697100。
- 内務省官報局，《官報》，2362、2748、6738 號，1891 年 5 月 18 日、1892 年 8 月 24 日、1905 年 12 月 14 日，頁 200-201、221、506。
- 辻元清美，〈砂川事件最高裁判決における我が国の司法権の独立に関する質問主意書〉，《衆議院質問本文情報》，質問第 550 號，1998。

五、電子資料

- 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日本帝國憲法》，国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gallery/000000000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明治天皇與日本帝國政府編，國民政府立法院編譯處譯，《日本帝國憲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 (<https://zh.m.wikisource.org/wiki/日本帝國憲法>)，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日本國政府編，日本國駐華大使館譯，《日本國憲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6%97%A5%E6%9C%AC%E5%9C%8B%E6%86%B2%E6%B3%95>)，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刑法》（明治十三年太政官布告第 36 号），維基文庫 WIKISOURCE ([https://ja.wikisource.org/wiki/刑法_\(明治13年太政官布告第36号\)#s2-1](https://ja.wikisource.org/wiki/刑法_(明治13年太政官布告第36号)#s2-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裁判所構成法》，維基文庫 WIKISOURCE (<https://ja.wikisource.org/wiki/裁判所構成法>)，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裁判官彈劾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 137 號），e-GOV 法令檢索 (<https://elaws.e-gov.go.jp/document?lawid=322AC1000000137>)，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

（責任編輯：董百坊、楊智盛）